

## 第1章

# 導論

在不同程度上，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不僅塑造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也影響了亞洲和拉丁美洲各新興國家的現代生活，其關鍵元素包括企業對資產的所有權、自由競爭市場、先進技術、競爭性選舉政治以及全球範圍的互動交流。它的成功、失敗和內部矛盾構成了人類社會分化的一種標誌。資本主義的支持者認為，這套體系基本上是健全的，它促進了人類自由，確保了人類發展，並取得了重大的科學進步。即使是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者也承認，在世界範圍內，物質條件已經有了顯著改善：人們的壽命更長，健康狀況也更好，商品消費及藉此接觸全球文化的速度都呈指數級增長。一個靠現代科學和技術驅動的社會在世界範圍不斷拓展，由此而來的一項偉大成就是人類福利水平空前提高。在20世紀末，人們的社會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人們普遍期望性別、種族和階級之間享有更大平等。然而，並非所有這些發展變化都來源於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更不用說它的新自由主義形態了。科學知識、生物技術的發展、驅動著全球化的高科技普及，以及應用於製造、設計和分銷等環節的機器人化 (robotisation)，都對生活條件和現代化生活產生了關鍵性的積極影響。

支持當代新自由資本主義形態的政治理論有很多。資本主義被包裹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外殼內——據其支持者說，這種形式已經在過去75年間阻止了民主國家之間爆發戰爭。全球化資本主義被認為促進了

自由與和平。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制定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常識」。如果經濟政策不起作用，那一定是人們對新自由主義的應用不當，而不是新自由主義制度和政策的意識形態假設有問題。在20世紀末，有影響力的那些國家都遵奉著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不可質疑，萬馬齊喑。

然而，自21世紀初以來，作為一種指導人們應該如何行動的理論、一種正在實踐的政治操作方式，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趨勢已經受到質疑。2007年9月，英國的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因無法滿足客戶的提款需求而面臨破產風險，隨即被英格蘭銀行援救，然後由英國政府國有化，接著又是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破產。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來臨，隨後國際性經濟衰退接踵而至。這些事件使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帶來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達到了頂點。儘管全球化的消費社會取得了進步，但在發達的西方國家，許多人對美國主導的、以促進民主和自由市場為名的干預主義(特別是目睹了這些干預的後果之後)感到失望。而在中歐和東歐的後社會主義國家(post-socialist societies)，一些人對失敗的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轉型都感到失望。在全球範圍內，2007-2008年金融體系崩潰後經濟危機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引起了巨大的沮喪和失望。

全球經濟衰退引發了公共領域對新自由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形態的再思考，其經濟、政治和道德基礎受到質疑。儘管幾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引領了生活水平的空前提高，但人類的大發展與極不平衡的經濟發展、不合理的不平等並存。在中心資本主義國家(core capitalist countries)內部，資本輸出與技術升級相結合，造成了就業波動，大量人口失業、生活水平下降；其他國家則喪失了一部分實質政治權力，因為「共享主權」並不意味著平等分享；資本流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區；西方國家主導的聯盟和國際機構推動自由化政策，被普遍視為維護西方新自由主義國家利益的霸權主義行為。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承諾的財富和收入增長，在國內各階層、國家之間分配嚴重不均，導致了極端的貧富分化，也引發了發達國家內部的不穩定。人員和資本、產品和服務的自由流動強化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優勢地位，而後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的「全球

南方」<sup>1</sup> 國家未能彌合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全球化維持了中心國家的權力，並使其他國家被迫陷入依附性地位。這是全球化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一些新興國家出現了顯著的經濟發展。

從半邊緣 (semi-periphery) 位置脫穎而出的新興國家並未成為統一的世界體系的一部分。中國作為一個工業和政治大國而崛起，結果形成了一個與中心國家相對抗的力量。工業化向新興國家轉移導致那裏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階級大規模增長，富裕的中產階級也在崛起，其中包括小企業家 (petty bourgeois capitalists) 階級。在西方所有後工業社會中，全球化促進了高成本體力勞動和非體力勞動向低成本地區轉移。對於中心國家的後工業社會來說，全球化幫助它們從新興國家獲取更廉價的工業製成品，而這種外包模式帶來了中心國家的重大失業問題，中心國家自身的技術升級和電腦化 (computerisation) 也帶來了重大的社會變革。

## 批判全球化資本主義

政治精英們採納了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並接受了生產部門向「全球南方」轉移所帶來的國內社會成本，他們認為這些成本會被全球化的積極影響所抵消，但是2007年的經濟危機使諸多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浮出水面。金融化作為新自由主義的關鍵組成部分，提高了公共風險水平，同時助推了財富差距不合理地增長。批評者認為，社會群體之間以及國家之間的衝突此消彼長，階層之間和國家之間的不公平統治和剝削成為頑疾，其原因正在於以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為特徵、以公司化財產為基礎的經濟，其中關鍵的驅動力源於在全球範圍和發達國家內部都居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雖然全球化新自由主義體系下發生的那些積極變化無可否認，但必須指出，當代社會存在七個重大結構問題——正是這些問題使我們呼籲改革：

---

1 亦稱「南方國家」、「發展中國家」，通常包括77國集團和中國。——譯者註

(1) 資本主義週期性經濟危機導致資本和勞動力的低效利用。

(2) 狹隘的財富所有權結構推動了不合理、不均等的財富和收入分配。

(3) 就業失去保障，移民問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混亂。前者是技術變革的結果，機器取代了工業部門的手工和非手工勞動；後者表現在國際層面，大量人口為了逃離欠發達國家、脫離貧困而向發達國家移民，這在全球範圍成為一種趨勢。受影響的本地社會階層出現了很強烈的不安全感，社會壓力漸增。

(4) 民主政府的結構性缺陷導致政治正當性不足。政治精英與社會各階層已「脫鉤」，統治精英主導了政治進程，政黨未能積極回應公眾需求。

(5) 世界體系中心/半中心/邊緣國家之間存在結構性不平等。儘管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教育水平上升，死亡率下降，但並非所有人都平等地從中受益。國家內部不合理的貧富差距導致某些社會階層的心理壓力無處宣洩，社會需求無法滿足，導致部分居民罹患疾病、從事犯罪活動以及早亡。

(6) 不受約束的、以利潤為驅動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和環境破壞，導致生態惡化。自然資源可用性已達到極限，消費主義和維繫其生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都難以持續。

(7) 世界體系中心工業化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英國）與半中心、邊緣國家之間的戰爭威脅並未減輕。儘管民主國家不會相互交戰，但它們經常同那些被它們定義為專制的國家發生戰爭。

以上描述的諸多問題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化浪潮之前就已存在，或者與其關係不大，對此我們必須加以區分。不應將世界上的所有問題都混為一談，或將它們簡單歸咎於一個原因——「新自由資本主義」。正如卡爾·波蘭尼 (Karl Polanyi) 強調的那樣，資本主義嵌入由歷史和社會構成的制度中，<sup>2</sup> 這些制度本身對社會生活同樣不可或缺。

---

2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1944]).

現代社會科學領域的批判家們堅持預言「資本主義的終結」。<sup>3</sup> 他們認為，危機不僅會導致不穩定，而且會產生矛盾、導致崩潰，並使資本主義被其他東西取代。幾十年來，危機屢見不鮮：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1980年代的公共債務激增、1990年代私人債務迅速增加、2008年金融市場崩潰及隨之而來的世界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和生態惡化危機、資本主義擴張引發戰爭、2022年的能源危機和俄烏戰爭，以及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導致社會凝聚力被破壞。<sup>4</sup> 克雷格·卡爾霍恩 (Craig Calhoun) 和喬治·德爾盧吉安 (Georgi Derluguian) 編選的文集總結了社會科學領域前沿的批判性思考，在後文我還會討論其他文獻。這些文集的作者們都強調「新自由主義」加劇了資本主義矛盾，並導致了有害的結果。

目前，關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有三種比較流行的主張。第一種主張認為資本主義會自發崩潰，並被一種未知的形式所取代。第二種認為全球化新自由資本主義可以通過改革，被另一種更溫和的自由資本主義或者某種國家形式的資本主義所取代（即所謂「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是指國家在經濟協調和調控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的經濟體系，而「國有資本主義」[state-capitalism] 是指國家擁有和控制經濟資產，利潤用於國家機構運轉）。第三種說法則認為，資本主義將被一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社會形態所超越——一種更為優越的經濟社會組織形式。在持第三種立場的人中，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是最受歡迎的。大多數有影響力的思想家認為，新自由資本主義可以被改良，但無法被超越，資本主義已經從諸多危機中以改良過、但依然完整的面貌重生。

---

3 三本出版於21世紀初的學術文集（其一為三卷本）專注於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及其可能的崩潰：(1) Craig Calhoun and Georgi Derluguian (eds.), *Business as Usual: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Vol. 1), *The Deepening Crisis: Governance, Challenges After Neoliberalism* (Vol. 2), *Aftermath: A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Vol. 3)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Wolfgang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2016). 其他相關書籍在本書後續章節中列出。

4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p. 16.

那些預測資本主義會自發崩潰的人，發現了資本主義的自毀傾向，發現了那些企圖控制或取代資本主義的政治運動的興起。馬克思 (Karl Marx) 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觀察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勞動力的剝削會導致過度生產，一方面導致利潤率下降，另一方面引起失業和貧困加劇；同時，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將導致勞動力被機器取代，機器能創造更大的物質豐裕，從而引入共產主義。尼克·斯尼切克 (Nick Srnicek) 和亞歷克斯·威廉姆斯 (Alex Williams) 等思想家發展了這種思路。<sup>5</sup> 在1930年代，凱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認為，由於需求不足導致的生產下降將導致自我引致的經濟危機。加爾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貝爾 (Daniel Bell) 和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認為，工業社會的發展將導致以技術為基礎的新型階級結構的崛起，並導致國家機器變強，從而削弱資產階級及其企業家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用社會主義形式的國家主義 (a socialist form of statism) 取代資本主義。在21世紀，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布茲加林 (Alexander Buzgalin) 和安德烈·科爾加諾夫 (Andrei Kolganov) 等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出了包含社會主義元素的「後市場」(post-market) 形式。<sup>6</sup>

這些不穩定因素可能持續發展並變得系統化，如果不加以注意，或將導致資本主義的解體、崩潰，最終被某種尚未被定義的社會形態所取代。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宣稱，資本主義「已不再可行」。<sup>7</sup> 他延續馬克思的觀點，認為資本主義不再為資本家提供積累資本的機會，他擔憂的是一個「在智力上、道德上和政治上都令人困惑不已的局面」，其發展結果「基本上是不可預測和不確定的」。邁克爾·曼恩

---

5 N. Srnicek and A.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London: Verso, 2015).

6 A. Buzgalin and A. Kolganov,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1). 他們認為這些社會主義元素涉及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大型企業的規劃、「社會責任企業」和非營利生產的興起，以及不屬於私人所有或控制的公共產品的增長。我將在第11章再次討論這些內容。

7 I. Wallerstein, "Dynamics of (Unresolved) Global Crisis," in Calhoun and Derluigan, *The Deepening Crisis*, pp. 69–88, quotation p. 84.

(Michael Mann) 指出，由於「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和當前消費文化的不可持續性，可能發生核戰爭和生態災難。<sup>8</sup> 左翼作家們一貫預言，資本主義無法擺脫其危機——危機是永久性的。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 斷言，「當代全球化壟斷資本主義的現實……是這個體系無法生存，正在進行中的崩潰是不可避免的」。<sup>9</sup>

與沃勒斯坦等人的作品不同，卡爾霍恩—德爾盧吉安文集中的作者們不僅譴責造成金融泡沫的原因，而且尋求改變國家經濟和金融機制以實現穩定的金融秩序。一些人認為，在經濟已經全球化的背景下，當前的經濟（尤其是貨幣）機構不合時宜，因此需要在一個全新的經濟和金融架構中尋求解決方案。這些提議屬於之前提到的第二類資本主義改良方案，呼籲改革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 (WTO)、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等。在政治、媒體、經濟和學術界的精英階層中都可以找到不少人持此立場，倡導對全球化資本主義進行改良，他們強調在現有資本主義框架內修改或調整新自由主義式的全球化。

過早地否定這些改革是不明智的。正如蘭德爾·科林斯 (Randall Collins) 所主張的，資本主義已經沒有任何途徑「逃脫」其終結的命運。與他類似，許多人都認為，技術已經無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市場已經沒有了地理擴張空間，擴大金融部門根本無法擴大勞動力隊伍，政府僱用和投資也無法解決失業問題。<sup>10</sup> 這種方法存在「超定問題」(over-determined)。對此，可能的解決方法包括縮短工作日的長度，使政府成為最後的僱主，並向所有公民支付生活工資；<sup>11</sup> 可以改組國際組織，例如 IMF 的控制權分配可以向新興國家傾斜。

---

8 Michael Mann, "The End May Be Neigh, but for Whom," in Wallerstein et al.,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pp. 71–98, quotations pp. 86–87, 97.

9 Samir Amin, *The Implosion of Capit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2014), p. 155.

10 Randall Collins, "The End of Middle-class Work," in Wallerstein et al., *Does Capitalism Have a Future?*, pp. 39–56.

11 Srnicek and Williams, *Inventing the Future*.

然而，一部分人懷疑全球體系能否進行任何重大改革。張夏準 (Ha-joon Chang) 談到：「對於新自由主義制度而言，危機太多，權力太大，學術聲望太高，以至於它不可能安安靜靜就離開。」<sup>12</sup> 沃爾夫岡·施特雷克 (Wolfgang Streeck) 總結了當前的學術氛圍，得出結論：資本主義「正在自行消失，因為內部矛盾而崩潰……資本主義之後……不是社會主義或其他定義明確的社會秩序，而是一個持久的過渡期……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時期。」<sup>13</sup> 20世紀的批判作家們將社會主義視為解藥，今天的社會科學家們不再如此，而是將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期視為一個持續的不確定和社會「混亂」時期。

還有些人拒斥以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城市社會為基礎的現代文明原則。吉布森-格雷厄姆 (J. K. Gibson-Graham) 提出了本地化社區合作自治型社會作為替代性方案——屬於之前描述的第三種方案。<sup>14</sup> 這種呼籲倡導更大的社會自治和去全球化，支持者囊括不同的團體，其中大部分成員尋求更民主和自治的聯合形式、「替代」類型的自治和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建立與全球化資本主義並存的替代性自治社會，其特徵是自治型經濟協調。其中有些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被後資本主義形式的生產和消費所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根本上被動搖了。這些社會主張尤其重要，因為它們的主要政策目標是生態安全和保護自然，主張抵制經濟增長和發展——正是這無休止的增長支撐著消費經濟。這股浪潮中還有些內容是聲明性的、喚醒式的，比如「反資本主義」和「反華爾街」的活動人士，他們的目標是揭露各種形式的社會支配和不公正。

---

12 Ha-Joon Chang, “The 2008 World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Development,” in Calhoun and Derluigan, *The Deepening Crisis*, pp. 39–64, quotation p. 61.

13 Streeck,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p. 13. 標重為原文所加。

14 J. K. Gibson-Graham,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我們還可以找到另一種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它尋求加強民族國家以便於控制國家經濟，並進一步採納由政府主導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他們針對的對象是全球化——有時作為資本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通常是作為一個單獨的現象。民粹主義運動囊括了主流精英中抑鬱不滿的那部分人、以及由於後工業化和去工業化潮流而遭受損失的民眾，他們組成了具有反精英傾向的階層。他們目標是朝著另一種「國際化」(internationalisation)形式轉變，其中各國相互依存但保留主權，並在邊界上行使控制權，國家可以通過福利國家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來保護自己的工業和公民。

之前試行過的替代方案(如蘇聯的國家社會主義和二戰期間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被廣泛認為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嚴重失敗。卡爾霍恩－德爾盧吉安文集的作者們不相信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會產生任何社會主義結果。例如，丹尼爾·奇羅特(Daniel Chirot)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錯誤地將危機視為資本主義末日的開始。他以1930年代的事件為例，認為大蕭條和戰爭是可能性更大的結果，這一觀點為2022年北約成員國和俄羅斯之間的代理戰爭所佐證。<sup>15</sup>大多數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的個別方面，而不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對定義了左翼政治的邊界，但並不代表他們就支持社會主義。例如，拉丁美洲在查韋斯之後選舉產生的左翼總統們將他們的政策定義為「深化民主和限制新自由主義……深化民主是他們的共同立場」。<sup>16</sup>社會主義並沒有被看作是一個可行的、對立於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且，在我之前引用的那些作品中也根本找不到共產主義替代方案的支持者。對於21世紀的批判家們來說，對立不存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

---

15 可參見：R. Desai, *Capitalism, Coronavirus an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22), Chapter 7.

16 F. Coronil, “The Future in Question: History and Utopia in Latin America (1989–2010),” in Calhoun and Derluigan, *Business as Usual*, pp. 231–264, quotation pp. 240–241.